

· 间谍的饮食 ·

附设在饭馆大厅后面的间谍的厨房不仅仅是大使馆中搞阴谋的秘密处所，而且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散发着诱人的食品香味的厨房。要知道所有境外的招募谈话都是在饭馆进行的，因此，我们的特工还是厨艺方面的出色专家、美食家。他们把地道的民族风味作为开启人们——甚至像日本部长助理这样聪明的人——心灵的钥匙。

1

你想知道在闲暇时光，晴朗的冬日里，苏联特工在驻地总部周围雅谢涅沃森林滑雪橇、散步时最常谈论的是什么？

也许，他们会回忆境外侦察工作中某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不，这是秘密工作规则所禁止的，除此之外，这种题目还会让人觉得不合时宜，因为大多数同事境外活动的岁月都是在半昏暗的间谍驻地写无聊的工作文件中度过的，没什么新鲜可言。

他们不谈论高层领导的活动，因为在间谍工作中充满告密行为，对上级机关的肆意评论可能带来不许出境的惩罚。

当然，他们也不谈论我国的对外政策，因为他们不止一次作为外交人员、记者或者商务工作人员出国。他们都很清楚，我们的报纸提供的国外生活许多是瞎说八道的，可对此说出真相却有很大的风险。在两个人中间这样的谈话是可以的，但是，当一大

帮子人出行去滑雪时，你又能说什么呢？

因此，看不见的战线的战士们只谈论一件事：那就是吃，不为国人所知的异国菜肴。谈论他所从事间谍活动的那个国家的主要菜肴，这个话题才真正贴近每个人，才有趣。

所以，来自伊朗的人不讲述霍梅尼的残酷制度，而是讲用鲟鱼做的极软的肉串，这种肉串是由技艺精湛的师傅在湿漉漉的海滩现场制作的。刚到过厄瓜多尔的特工不是愤怒地揭露那里当权的亲美傀儡集团，而是垂涎欲滴地回忆那里的地方风味。在直接安在饭馆餐桌上的烤炉里摆上切成碎块的牛肉，它们分别取自牛的不同部位，这种有细微差别的美味碎牛肉，再佐以智利的优质葡萄酒，能使人回味无穷。

有机会在德国工作的人不无激动地回忆起猪肉制品：“爱斯拜”烤猪蹄，炸猪尾、猪耳朵和猪筋，还有各种名牌的德国灌肠。

走进一间德国政治间谍处的大办公室，你可以看见两米见方的结实条幅，上面印有献给图林根灌肠的打油诗。虽然是俄文字母，但是印刷上的某种难以捉摸的区别使人觉得文本是在国外制作的，最有可能是驻德苏军的一个印刷厂制作的。因为国内印刷机器都处在克格勃的特别监控下，印刷厂的领导犯不着为印几套这样的歪诗去冒被苏军特别处人员监视的风险。

原来，图林根灌肠和其他各种品牌灌肠的区别在于，它可以生着放入切成两半的长形白面包内，在炭火上烤……打油诗写得不专业，没才气，比如其中有这么两行：

怎样烤中间，
请君翻背面。

尽管无人不晓，灌肠无所谓背面，但是当你读到这句诗的时候，仍然可以想象出脂肪汁怎样沿着面包片四处乱淌，它怎样在热炭火上吱吱喇喇响，烤肉的香气和松枝的清香怎样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

严格地讲，这样的歪诗挂在间谍处不是地方。除了它的内容不严肃外，还明显证明，我国没有这样的灌肠，而且在吃的方面存在问题。但是，头头们谁也不要要求摘下这幅非政治性的宣传条幅，因为他们不想制止关于吃的没完没了的夸夸其谈。职业特工认为这是一种经验交流：因为很少有人知道，所有侦察工作都与吃有最紧密的联系！除了像把尸体拖进树林这种特别秘密的行动外，所有其它工作都是在饭馆的油烟下，在觥筹交错和进发的哈哈大笑中进行的，苏联特工轮流发表赞美的祝酒辞，无论如何都要说服自己的共同进餐者同意合作。

任何时刻反间谍人员都有可能走近桌子，将两人都逮捕，这时，我们的特工生涯就完了，但他仍可以克服恐惧，用响亮、激动的嗓门喊出：“服务员，再来两杯啤酒……”

所以说每个苏联特工都是一个细心的美食家。他们几乎每一天都得去外国餐馆，第一年末，在境外工作的特工头脑里已经把工作和吃连成一体了。

夏天他就会到莫斯科去度自己的第一个假期。

兴奋不已的特工们在各办公室之间频繁穿梭，大声谈论自己的工作，就像在国外间谍处时一样，没人制止他。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放声大笑。

“和日本人会面用不着精心安排，大家都清楚：两杯咖啡，外加一块点心，就拜拜，”一个人挥挥手激动地说，“初次见面是为了确定个人关系——先来一块牛排和一杯啤酒！对手就开始猜测，你是个什么样的间谍，这时你就在中国餐馆定八个菜！该涉

及策反问题了——在日本餐馆里开一个包间，订炸虾和炸 鹌鹑！如果真进行招募谈话，那就到法国餐馆去吃大鳌虾，喝酸葡萄酒。”

“不久前我们东京间谍处来了一位新同事彼得罗夫，来自外省克格勃，”一种我不熟悉的细嗓音附和道：“他声明，‘我不和间谍到日本餐馆进餐，我不能吃生鱼片！’可能肥油加伏特加更合他意。这种习气，怎么能和日本人一起工作呢？”

“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低头看着厚厚的间谍日志，想道，“下下饭馆，吃吃喝喝，还要当着成百人的面，哪有什么秘密活动可言？这叫什么间谍工作？”

但我是一个刚从间谍学校毕业的学生，不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虽然我已到过日本，甚至还观察过一次间谍的会面。

那次会面也是在饭馆进行的，一家很贵的中国餐馆。我们领取极少助学金的苏联进修生自然不可能用自己的钱去那里。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吉努嘎斯，第一部苏日合拍的电影《小小流亡者》的导演，邀请了我们一行十人。我们小组的领导 B. 在他拍的片子里做翻译，于是，慷慨的老头儿就决定这样感谢她。

我们很高兴平生第一次有机会吃中国菜。我们感激地吃完一盘又一盘，尽可能地参加席间谈话，过分热情地向主人礼貌地微笑。著名导演对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进修生的关切，五颜六色的彩色纸灯笼装点出的饭馆的节日气氛，加上好吃丰盛的菜，慢慢消除了我们的拘谨，融洽、和善的气氛包围了大家。

突然，某种不平常、奇怪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心里一阵发紧，好像谁把我用冷水冲洗了一般。如果回到莫斯科，我也会当特工，我将担任特别重要的工作，现在就应该从实际做起。

我的脑海里闪过教学电影镜头，教师在上面做的注解……且慢！现在我眼前正进行着典型的间谍行动……

现在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注意力是从什么时候被坐在远角落桌子后面的两个人吸引过去的。一个粗壮的中年欧洲人和一个上年纪的日本人。原来，在我们酒席进行的相当长时间里我都在不由自主地观察这奇怪的一对。显然，他们引起了我的怀疑。

欧洲人我看不见，他背对着我坐着，但正是他的背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它不自然，有点紧张状态，似乎它有感觉危险的能力。

这俩人在谈什么，很难确定，但是从他们不时信任地向对方凑过去的动作来看，谈话绝对是机密的。某种秘密将他们连在一起。

日本人终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举起杯子，说了一些祝酒辞，看来是既深奥，又重要，实际上他们可能什么也没说，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只是无声地张了张嘴。

然后他从放在他旁边地上的公文包里取出来一包东西，它用厚实的纸包在一个有提手的兜里。这件重物是什么？美国火箭的襟翼？高速车床的零件？日本人低着头把放重要物品的兜交给了外国人，外国人急急忙忙地把它放到桌子底下。

日本人露出自我满意的微笑。你可以推断，这绝不是什么一般礼物。

这包东西由另一个人来包装：他深深鞠躬，满脸堆笑，同时又不表现出任何感情，如果这东西很贵重，他应当面容恭谨，如果这是个便宜货，那他可能表现得很惭愧，但他却毫不动声色。他在这里极仔细地包装，把它装进红纸包里，扎上丝带，把打结处系成一朵玫瑰，并把自己的名片放在玫瑰上。当包装纸比礼品本身贵，礼品显得不值得包装，而你却认真包装时，被视为有风度。

“难道我以后也得这样做吗？这算什么秘密活动呢？”我想。

“您能说说，为什么你们要在人声鼎沸的饭馆里会见间谍呢？这算哪门子间谍活动？”我问回来休假的同伴们。

他们面露沮丧的神色。

“你怎么就不明白，”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我解释，“外国人不会花时间跟你推心置腹地谈话，他需要为花去的时间做出补偿，业务谈判的最佳方案是在饭馆里吃午饭。这在西方很流行。”

“如果那时送你一枚弹道火箭的碎片，还吃什么午饭！再说，如果警察坐在里面呢？”

“说这话可要小心，特别是在首长办公室！如果禁止我们在饭馆和间谍会面，那么谁也不会同我们打交道，到时候怎么报销呢？你要明白，”他继续威严地说：“日本的饭馆绝不像我们一样，到处都是反间谍人员！光东京就有八万家饭馆！难道能像我们一样每家都派间谍，还招募所有服务员协助工作？除了我们克格勃，谁也支撑不住！再说，莫斯科就那么二十来家饭店，数量又不再增加，所以我们能观察和控制它们！”

对此你不能不同意。对什么都不怀疑的外国旅游者不时在我们的饭店碰上不愉快、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事情。比如他刚到饭店坐定，给自己叫一瓶矿泉水，突然一个服务员从后面过来，从他鼻子底下拿起来瓶子就跑……

困惑不解的旅游者认为这是苏联人没教养的表现，其实原因很平常：间谍——服务员把瓶子带给藏在窗帘后面的克格勃同事，而克格勃特工则取下那个倒霉外国人的指纹。如果那个外国人真是一名间谍，此举可能惊动他，但我们的反间谍人员却可以在上司那儿领到奖赏。

如果外国人吃完午饭在大厅休息或者同某人见面，立即就会出现神色严肃、嘴巴紧闭的清洁工，一句话也不说，把这里的水晶烟灰缸换成一个黑塑料制成的难看烟灰缸。

孩子般幼稚的外国人没想到这里有什么诡计，继续平静地谈话，浑然不觉，从现在起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录在一个极小的录音机上，那上面的磁带被换成极细的电线，可以在长时间内不换磁带，进行不间断的录音。

有经验的特工在揭露这个小秘密时告诉我们：你来到任何一家苏联饭店，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察看一下附近的烟灰缸。如果烟灰缸的底是用螺丝拧上的，那在桌旁谈话的时候就要谨慎，别无意中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因为不知道克格勃在检查谁：是你领进饭馆进行策反的外国人，还是你自己。

有时候烟灰缸不小心被碰翻了个儿，外国人的目光就会落到各种颜色的电线和圆形电池上。

这样丢脸的事情必须赶快处理，任何时候也别叫克格勃领导知道，他对每一个被识破的行动伎俩都恼火，会惩罚当事人。

在我们的饭店工作的所有服务员，直到清洁工，都是克格勃的情报员，如果需要偷听在厕所里的谈话，她会毫不客气地进入男厕所。对不知情的人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那些戴镶金边帽子的粗鲁、壮实的老头。他们笨拙、睡眼朦胧、不胜任衣帽间的简单工作，但是，他们用浮肿的眼睛凶神恶煞地盯住每一位来访者，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过去都是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参加过镇压、甚至酷刑拷打。饭店衣帽间的侍者不收其他人，认为不特别可靠。这些退休军官的危险在于，由于多年来在贝利亚时代养成的习惯，他们在自己的间谍日志里写上他们认为需要的一切。

当然，他们搞不清，哪件大衣是国外间谍的，那件是策反它的克格勃同事的，但为了以防万一，他在自己的告密汇报中同时诽谤他们俩……甚至连我们的特工干部也努力避开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同他们有什么接触。

同时，在比他们更年轻机灵、有文化的克格勃特工眼里，饭店里搞出了许多具有苏联制度特色的鬼名堂：虚报或少报账，缺斤短两，非法出货，或者相反，非法进货。但这些克格勃都不感兴趣，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来访者中是否有人说了不符合政治标准的话。

其实，饭店的工作人员可以理解。国家付给他们这么微薄的工资，100卢布多一点儿，用它不可能来养活家庭。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菜量减半，用省下来的食品养活家庭，因为商店里没什么东西好买，也没钱可以买。

减半的菜量对日本人来说足够了。但是，日本人可怜的胃不能适应我们的食品。

他们特别不能适应我们饭店端上来的肉，要么太咸，要么太肥，而且总是很硬。不知道为什么西方人会做上好的牛排，在它上面再浇上浅玫瑰色——金黄色的汁儿。日本人吃了我们的肉就肚子疼。而且每一次日本旅游者进餐，都有一大堆肥肉块儿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这是为了宣传目的，好像要说明，苏联国内不存在肉食品问题，尽管实际上存在这类问题，西方的报刊大肆宣扬，我们的公民也在窃窃私语。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也有承担翻译的义务，陪同日本旅游者在我国观光。我们被派到“国际旅行社”进行语言实习。这是共青团政治信任的标志，发给相应的证书和介绍信。因为不经批准的苏联人和外国人的交往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被克格勃机关禁止的。但现在执行得已经不像斯大林时代那么严格。

我带的团全部由经济学家构成，应科学院的邀请前来我国。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天，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行进行了几场无聊的辩论。第二天一早，日本人出发去了里加。

安排好旅馆入住后，他们躺下休息，我去和饭店领导拟定即

将到来的午饭的菜单。

穿制服的一男一女向我走来——领班和他的女助理。他们开始用略带波罗的海口音的俄语做自我介绍。我一个 20 岁的大学生对此完全没有经验，我稍有点儿紧张地翻着冗长的菜单。

看到我不知所措，俩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首先建议辣汁儿煎肉，这是我们的民族特色菜。”

说到这儿，他们愉快地交换一下眼色——看来，这是菜单里最贵的菜。我可以想象，如果在这里——欧洲的门槛儿旁边——再碰上那惹人厌烦的宣传式接待，日本人的脸该拉的有多长。

“你们没有什么清淡一点儿的吗？”我怀着希望胆怯地问道。

“您是指鱼类菜肴？有，我们波罗的海的七鳃鳗！但这只是冷盘。”他们冷淡地回答说。

“七鳃鳗”这个词对大多数苏联公民来说比较陌生。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要知道，在大众化的商店里根本就不卖这种最讲究的波罗的海美食，它们都进了内部食品店，分配给首长。占据各大部部长岗位的公民获准进入机关小卖部，有权购得几块七鳃鳗。回到家后，他可以骄傲地展示给妻子和孩子们。我所诞生和成长的家庭有权进入这样的小卖部，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这种美味的稀有鱼。

“请你们午饭只给我们上七鳃鳗！如果有两份的量就更好。”我央求道，担心像在内地那样，常常被拒绝。

“这有什么，好吧！”我的交谈者同意了，由于莫名其妙，耸了耸肩。其实我定的菜已经相当贵了。

在桌子旁落座后，日本人高兴地喧哗起来，终于看见了他们或多或少习惯了的食物。切成三四公分长的七鳃鳗块排成厚实的几排，整整齐齐地放在两个巨大的盘子里。上面洒满了切得细细的圆圈状葱花儿。每个人给了两个小碗，分别装着姜醋汁和芥末

汁，用来蘸七鳃鳗吃。出于日本人爱刨根问底的天性，我的旅游团成员几乎异口同声地问：“这种鱼叫什么？”

“七鳃鳗，”我用俄语回答，‘日语这个名称的对等词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词俄语自己的表达方式听起来太像日语了，日语的特点就是辅音和元音交替。很像日本的鳗鱼。’”

“确实很像，七鳃鳗是鳗鱼的亲戚。”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说。

好像该是停止讨论、开始就餐的时间了，但是，没这回事，日本人想知道像日本名称的这种神秘的鱼的详细资料。不得不请领班了。领班说，七鳃鳗根本不是鱼，而是长得像鱼的一种动物，有 30~40 公分长，像蛇一样的身体，无鳞，身上粘液丰富。七鳃鳗没有骨骼、胆和肠子里厚厚的食物残渣，所以，做七鳃鳗不用开膛，仅仅去掉头就行了，因为它的鳃里积满淤泥和沙子。它的吃法一般是先炸好，再蘸汁吃。七鳃鳗在波罗的海、巴伦支海、白海和里海里储量丰富。

我们真诚感谢领班讲的这么有趣、这么包含信息量的故事，开始拿起刀叉。没有人讲话，只听到有力地吞食七鳃鳗的咯吱声和真正美食家的赞叹声。

在那些日子里我和一位年轻的教授产生了友谊。他姓塞芒，这个姓很稀少，说明他是贵族出身。和其他受过传统教育、上年纪的日本人不同，他能说流利的英语，而且外貌也像欧洲人。那时我的日语还不够流利，因此常常用英语和塞芒开几句玩笑，这明显侮辱了他的同事，认为这是对日本精神的某种背叛。

我的大多数年轻同事开始在国外工作都非常困难。他们以前几乎从未去过国外，不会自由自在表现自己，实际上除了苏联提供的那些歪曲的情报，对将去赴任的国家一无所知。应该给他们两年时间住在那里，掌握口语，习惯丰衣足食的环境和日本人固有的自由同时又拘谨的交往方式。

但是残酷的克格勃领导强迫他们立即投入间谍斗争的漩涡。他们完全遵照斯大林的传统，确信在莫斯科学到的理论知识完全够用，在国外会感觉如鱼得水。当然，当地的反间谍机构立刻就捕捉到这些幼稚特工的蛛丝马迹，并监视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制造丑闻。

在所有国家中间，当然是日本的情况最复杂。它特有的思维方式，它的古老，还有它不为普通苏联人所知的极其复杂的语言。我们许多刚开始工作的特工好不容易认识了一个落网的日本人，有时候却不知道与他从何说起，而在他们面前摆着重要的策反任务！

善于建立关系，为在日后把自己的新朋友改造成间谍而去认识人，对我们的间谍来说是最主要的任务，正是这项任务很难完成，特别在事业的初期，困难最大。

我和别的同伴不同的是在日本已经有一个熟人。他就是塞芒，够我以后忙活的。他是个聪明又有前途的年轻人，也许早就引起了我们间谍机关的兴趣，剩下的只是检验一下而已。我把他的名字写在一个特殊的纸片上，把它寄到特工档案馆。那里搜集了全球所有落入克格勃视野的人的资料。某种东西提醒我，那里可能有关于塞芒的资料。

特工档案馆就在雅谢涅沃的一层，对于你的咨询那里回复得很快，只要几天。常有的是上面就盖一个“没有情报”的戳。相反，如果回复得比较慢，则说明有希望，那就是说，某个神秘的人坐在那里，没准儿就坐在隔壁的办公室里，正在决定是否告诉你感兴趣的人的真实情况以及你为什么要想关于这个人的情况。这就说明你的选择没错。

关于塞芒的事就是这样。过了两周还给了我咨询卡，它的背面写满了提到我的熟人姓氏的卷宗号码。

原来塞芒早就落入政治间谍的视野，因为他恰好是新部长 x 的助理。他没有人任何机关工作人员名册，做的却是管理干部的工作，这说明了他的重要性。

克格勃想尽快接近塞芒，通过以前当过间谍处军官的现任苏联大使馆外交官员，由我们出钱，从莫斯科秘密派一个经济学家代表团出访。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无益！塞芒对苏联人很冷淡，不让任何人请他到饭馆吃饭。他大概猜到无拘无束的饭桌旁的谈话过后，紧接着就是纠缠不休的友谊，然后自然而然过渡到提出策反建议。

也许，塞芒通过在我方雅谢涅沃当间谍的日本秘密情报员完全准确地知道我们对他的兴趣。“您不担心塞芒把您驱除出境？”政治间谍处日本科的科长撇撇嘴，问我。

“我希望不要发生那样的事！”我不十分自信地回答。我很不愿意相信，像塞芒这么有教养、这么容易接近的人会做出如此残酷的行为。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他交给你们科技间谍！好好做他的工作吧！”科长嘟囔了一句，就又埋头于他的文件。我勉强抑制住兴奋，急忙离开了办公室。要知道，对塞芒进行策反工作的只能是我！

简直难以想象我给东京间谍处写出第一封公函时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我已经不用自己的名义，而是用公函惯用的表达方式——“我们认为”或者“按照我们的意见”陈述了苏联间谍机关高级领导的意见。在信的末尾提到，很快就会有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同事前往日本间谍处，他直接从事策反塞芒的工作。一位大首长信上签了字。

2

来到东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遍它位于皇宫周围的所有的古老胡同，欣赏我在大学时代就记住的那种特殊气氛和这些地方典型的特殊气味：柠檬、盛开的木兰、绿茶的清香和热酱油的略微有点呛鼻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还夹杂着少许优质汽油、炸鱼、还有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的强烈气味，正是这些构成了谁也不能彻底搞明白的东方魅力。

这里——品川，我从未来过。在古老的年代，这里是东京的偏远郊区，咸咸的海风肆虐的小渔村。虽然今天品川已经划入日本首都的中心，但是在它那里和在银座一样，豪华轿车的轮胎轻轻摩擦地面，人行道上散发着香水味，至今可以感受到一种外省情调。茂盛浓密的绿树和旧异教神殿周围的灌木丛就是证明。现在神殿四周已经盖满了高层住宅。

在品川的山岗上矗立着一幢白色的建筑物，它与别的其它建筑毫无二致。这就是苏联商务代表处，它纵深处的几个秘密房间就是克格勃间谍处。

它一开始被设计作住宅用：谁也没有告诉建筑师，怕他们预见到社会主义祖国国外代表处的秘密房间。现在那里——首长办公室旁边一件无人问津的接待室里，克格勃科技间谍处的副处长正在等我，他的名字叫尼古拉。

商务处不知情的人什么时候也找不到这个房间：入口处与规定建筑相连。即使进商务处也不那么容易。

“你是谁？”一个苏联看门人阴沉地问。大门口暂行看门人实际上是由商务代表处的普通工作人员轮流值班担任，但这项职责令人讨厌。

“塔斯社记者！”我高傲地看着旁边回答，要让他知道，我已进入特殊记者行列，从事某种秘密工作，可以给商务处的任何人制造很大麻烦。

看门人立刻明白了这一点，脸上的表情也温和了些。他默默地按了一下按钮，打开了沉重的钢制门。

在半昏暗的门厅里，还有一道门挡住了我的去路，也是铁门，但是，那里的看门人现在不用我自报家门就打开了门。

我沿着楼梯走上二楼，商务处的不少工作人员西装革履，在宽敞的走廊里无聊地闲溜达。看样子，他们没什么好干的。

几个门朝走廊开着，漆成一样的灰色，我搜索到要找的门，走进空空荡荡的房间。这里是无数苏联外贸联合组织代表之一的办公室，这个职务从一开始就归克格勃管理，所有占据这个职务的人在战后几十年期间先后交替，因为他们都是特工，所以在自己办公室出现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使馆或者商务处度过，其实离得很近，仅一墙之隔。

商务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在这个房间里还有一道特别的门，所以都害怕向这里张望，以免怀疑他们进行对日本人有利的间谍活动。但是新闻社、塔斯社、国际旅行社，甚至海军舰队代表处的年轻人却让这道门四敞大开，彼此高声喧哗。这些人都是特工。

去间谍处的入口就在这儿。

“有一封关于什么塞芒的信等你过目！”尼古拉从桌子后面欠欠身，向我伸出手，我立刻恭敬地握住了。“听说过，我听说过这个塞芒，甚至还认识他！”尼古拉镇定地继续说，“在部长招待会上认识的。原来他会说俄语！”

我礼貌地笑了笑，因为不能立刻判断出，从克格勃的角度看，这样做好还是不好。

“他是个容易接近的人，”首长若有所思地接着说。“好吧，既然中心给了你和他见面的任务，我也不能反对，虽然……”

这种讲话方式在克格勃领导中间是常见的，尼古拉意味深长地停顿下来，试探性地望着我，极力想弄明白，看我怎么续完下面的句子。

对于这类东西我在莫斯科早就习惯了，因此我心里还在想着别的事：在我生平第一次用公家钱的时候可别碰钉子。

“在饭馆里招待客人要花多少钱？”我小心地问，“请您理解，这是我的第一次业务会面。”

“一万日元，”尼古拉告诉我；“但有可能还要少。”他结束时神秘地笑了笑。

由此我得出结论，我的第一次行动花销要格外小心。首长想立即了解我是不是那种用苏联人民的血汗钱大吃大喝的人。

“该不该让饭馆开发票？”我期待地问。

我看过许多行动案例，已经了解，为了不让被策反的外国人猜到他月底在间谍处报账，苏联间谍没必要从饭馆开发票，“那就开吧！”尼古拉不太客气地说。我明白，我的第一次会面不仅是对塞芒进行试探，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考验。我还感觉到，第一次应该仅限于谈这些问题，因此就起身告辞。道别时我们彼此客气地笑了笑，这很不像军界常有的那种关系。

打听到塞芒的家庭电话比容易还容易：他是多个科学协会的成员，协会的资料详细记载了关于他的所有材料，直到根本不需要的。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我甚至给莫斯科发了一封长信，包含了塞芒自传的补充材料。它帮助填写未来间谍的履历，在克格勃间谍工作中，对专案文件中任何新文件的评价都很高，比实际的侦察工作要高得多。

一拿起听筒，塞芒立即听出我的声音，我们马上开始寒暄。

他也许回忆起我们短时间的友谊，和在那段日子里那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感觉。

我提议见面，塞芒毫不犹豫答应了。确定了见面地点后，我立即挂上听筒，不能因长时间的电话交谈而毁了一个人的命运，还有可能某个未知的人在监听这个电话。为了打这个电话我跑到繁华的中心大街银座，因为塔斯社代表处周围的自动电话可能被警察监听。

为了同塞芒的第一次会面，我选择了东京绿岛上一个不大的饭馆姚基，它是现在条件优越的年轻人看上的地方。

战前这里曾是贵族的郊外别墅，它们是用纸和薄木板做的，这在日本很流行。轰炸时它们统统化为灰烬，日本投降后，在这片空地上建起了美国军官私宅一条街，叫“华盛顿高地”。过了几年占领结束后，姚基被重新夷为平地。慢慢这里又开始出现新楼房，在它们的一层开设了一些不太贵的饭馆，因此，大学生们看上了这一地区。这样的地区在东京不止一处，但只有这里保存了公园，这公园是在原来的田野上开辟的，好像还保留着稻子甜腻腻的香味。每逢晚上它那清新的呼吸都给有些醉意的客人带来特别的乡野情趣。

这里的大多数饭馆专营欧洲风味，但是，考虑到日本人的喜好，口味已经有所改变。欧洲人讲究排场的作风已经人为抬高了饭菜价格，每套用具都有几副刀叉，甚至为每一瓶柠檬汁配备了一个带弹簧的小小开瓶器。在这种“双重”享受下日本人感觉到无可比拟的舒适，再加上姚基的价格不是特别贵。

当然，部长助理出现在这里总归有点不合适。但是我邀请他来的，即暗示了我的年龄小，不谙世事，不知道塞芒有多高的社会地位。

他在规定时间准时到达那里。我们老远就相互看见了，并且

高兴地深深鞠躬。

塞芒向我投来友好真诚的目光，好像要看看我有什么变化，这几年长大了没有。他自己没什么明显的变化，这是蒙古人种的特点。

我们立刻去了饭馆，入座时塞芒有意看了看表。

“你可以分给我一小时吗？”我赶忙问。他友好地点点头。

和当地的所有教授一样，塞芒身着暗色的灰绿色风衣和几乎一样颜色的西服。他慢慢脱下风衣，不经意地搭在椅子背上。

“怎么样，近来还好吗？”他边坐边问。

我开始讲述自己的记者生活琐事，当然，绝口不提属于克格勃间谍处。

这时，侍者拿来了硬皮面的厚厚的菜单。翻阅菜单时我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因为生平第一次不是富裕的外国人请我这个贫穷的苏联人下饭馆，而相反，是我请他，尽管是用我国政府的钱。

第一页上写满了我不认识的菜名：我那时还不知道玻璃大高脚杯或者法国浓汤。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两道典型的欧洲菜，世界各大饭店都有。

终于菜单里出现了一个我很早以前认识的词“布雅拜斯”。好像是一种法国鱼汤，在间谍学校时老师给我们讲过。

记忆中立刻出现了莫斯科的一个私人府邸，内有一个不大的、有雕塑天花板的明亮大厅，它被大花园的绿树掩映着，所以从日夜喧闹、近在咫尺的萨多夫环路上都看不到它。革命前这所私邸属于一个商人，但很快被中央委员会占去并长期控制。在斯大林时期这里住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将军和他的一家，其它情况就不知道了，而且也不应该打听这类事情。

有一天我和其他听众有机会去往那里。我们穿着笔挺的西装